

撒

旦

文

从

主编：柳鸣九

偷 食 禁 果 后 的 性 觉 醒

魔鬼附身

（法）拉迪盖著 李玉民译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撒旦文丛”(代总序): 与“魔鬼”签契约记

柳鸣九

1. 我藏有一套“禁书”

我走进巴黎市区一幢灰颜色的公寓,金德全君从里面迎了出来,告诉我这样一个消息:“克里斯蒂安·布格瓦先生送你一大包书,他托我转交给你。”

那是在 1981 年,我第一次访问巴黎回国之前不久的某一天。我记性并不好,又事隔多年,要是别的事,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此一幕,这句话,我却一直记得很清楚。

·德全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系第一届硕士研究

生,早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一进社科院就显示出了高水平,他既有语言天赋,又有文学才能,如果沿人文道路走下去,成就是未可限量的,但到法国攻下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他就转向搞经济与技术,在事业上很是成功,成为了一个世界级法国大公司在远东地区的总经理。我那次访问巴黎时,他正在巴黎大学奋斗。他与巴黎著名的出版家克里斯蒂安·布格瓦很熟,我访问 10/18 丛书的这位主编,就是由德全君安排并陪同的。^①

访问巴黎最大的愉快之一,就是得到名士亲笔签名的赠书,他们一般都赠得甚有节制,超过一两本的比较少,达到“一大包”的则“凤毛麟角”矣,记得只有米歇尔·布托、皮埃尔·瑟盖斯、雅克·雷达等两三位。我一听德全君此语,倍感高兴。而打开这一大包书,就更是喜出望外了,克里斯蒂安·布格瓦先生送给我的,原来是十几本萨德的小说作品,基本上构成了萨德的“全集”。

我喜出望外,并不是因为我正需要萨德的作品有用,更不是因为我喜欢或仰慕萨德,恰巧相反,直到那时为止,我对萨德是封闭少知、盲目摈拒的,并且还简单化地持有批判的态

^① 见拙著《巴黎名士印象记》中《10/18 丛书和它的转向》一文,该书 138—147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度。我之感到特别高兴,是因为这套书大大满足了我的“藏书情结”,从未满足过的“藏书情结”。

读书人喜欢藏点书,不论是真正爱书也好,还是有附庸风雅的成分也好,都要算是一种雅趣,可惜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绝大多数都没有追求这种雅趣的条件。五十年代从学校毕业后,低工资只能保证自己与亲人的温饱,那时是没有多少钱来买书的,不可能成为“藏书家”,特别是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的原版书,更是既买不来,也就无从藏了。要拥有原版书,你总得出出国吧,或者像我们的老一辈那样是从国外回来的,但我等参加工作后整整二十年之中,都被关在国门之内,不断被“上山下乡”、“滚泥巴”、“意识形态中的兴无灭资”、“阶级斗争”、“思想批判”这些神圣的大事折腾来折腾去,能从图书馆借到一些外文书读读,就算不错了。当然,在那些政治气氛浓烈的岁月中,也有像绿色孤岛一样片断的“和平时期”,在这种时期,到东安市场逛旧书店,就是生活中一大快事了。在那里,费些劲也能搜集到一些陈旧的外文书,历史、文学史与单本的文学作品都有,大概是一些早先从国外回来,因为境况比我等更糟糕的老一代知识分子贱卖给旧书店的,听说有些书还是从历次政治运动冲击对象的家里充公而来的。我从来没有收集到多少特有价值的外文书,只购置到手一套六卷本的魏尔

伦的诗歌全集，五成新，花了我不少钱，可惜文化大革命中下干校时，存放在军宣队掌管的仓库里，后来不知去向了，连同几十本三套丛书版的外国文学名著……

克里斯蒂安·布格瓦的这大套书，一下就使我可怜的“藏书库”骤然猛增，焉得不乐？何况还是一套萨德的作品，真正意义上的禁书！

“物以稀为贵”。凡是被禁的东西，一定是更“稀”，也就更“贵”。似乎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就隐约听说过，中国有不少“春官画”这种玩意，但一般人收藏不到，也不敢收藏，只有党内某个酷爱文物的理论权威××才拥有。大概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出来了一个正式规定：凡是在京的重点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等几个特殊单位中的研究员与教授，可以在内部购得一套未加删节、原汤原汁的《金瓶梅》。后一个正式的规定显然印证了前一个传闻。可见有权收藏禁书、禁画的，非要有高级的身份、高级的职位不可，我等初入道不久的小人物，当然无权问津。因此，我一直未见过真正的禁书，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有一个当时掌权的革命组织把从“牛鬼蛇神”的家里抄来的“四旧”堆放在办公室里，凡尚未失掉“革命群众”身份的人皆可自由出入那两间办公室，而在那“四旧”堆里，就赫然有一部司局级以上干部才可拥有的《金瓶梅》，于是，不少人就有机

会过来翻阅几页,然后带着轻蔑的态度评说那么两句以示自己的革命性……真有点逗,我见到了《金瓶梅》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普及……

我没有收藏到中国的“禁书”,倒收藏了一套外国的“禁书”……在法国,萨德的作品五十年代还不能公开出版,到七十年代就已经能公开出版了,算不上“禁书”,但在中国的八十年代初,却怎么也要算是一种禁书,要知道,直到那个时期,删节本的《金瓶梅》在北京的书店还见不着呢……

收藏到这么一套书,很弥补了我的自身缺憾感,更满足了阿Q式的自我虚荣心……本人本来就非“根正苗红”,与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各种官方庙堂荣誉从来无缘,没想到从法国人那里收藏到了国内惟一一套萨德禁书,总算“拔了一次尖”,捞到了一份“布衣荣誉”……

2. 束之高阁,藏而不用

萨德作品集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藏书”。藏而不用,束之高阁,仅以“藏有禁书”而自诩。

藏而不用,首先是因为时间问题。自从1979年法国文学史的上册出版以后,我的中心课题就一次又一次转移,离十八世纪愈来愈远。当然,我深知上册中我对于这个世纪的一二

十万字的议论，深度并不够，但我实在没有时间与精力回过头去深化对启蒙时代的研究。那些在历史发展中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启蒙思想家的精神财富，我还没有来得及全部研读、参悟透彻呢，萨德这样一个特殊人物还是“先靠边站站”吧……对不起布格瓦先生，您的藏书，我“封存”起来了。

藏而不用，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我的局恨性“保守性”。

我不是一个冷静的研究者，我经常陷入“情绪化”。在人文科学中，面对研究对象时的“情绪化”，虽然不如在医学中那样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但也足以大大影响对待的态度与研究的结论。说实话，对于人文范围里有的研究对象，我经常“情绪化”到了惟恐避之不及，就像碰见了瘟疫一样。

年轻的时候，每当我拿起魏尔伦的诗集时，一想到他与韩波那颠三倒四、乱七八糟的生活，一看到他蓬乱不洁的胡子跟秃头上的头发连成一大片的头像与他那双带有暧昧邪意的眼睛，我就感到一种虽然轻微，但却明白无疑的生理的厌恶，因而老不愿意进入他的诗境；同样，纪德在私生活中的那种根深蒂固、无可救药的同性恋癖，也使我很迟才去研读他的作品，并经过了很久才逐渐克服内心深处对他作为一个作家的逆反心理。

我自己这种明显的“情绪化”倾向，并不是由于我在观念上是很“道德化”的，事实上，我是很不道德化的，甚至是相当反道德化的，如果我认定一个人的某种情态、性态、世态是出于人性的正常要求，但却有违于某种道德戒律、不符合某种道德意识形态时，我是愿意甘冒道德之箭的射击，挺身而出为之一辩的，从大仲马的放荡、雨果的拈花惹草到于连的人格分裂、包法利夫人的通奸……关键是要“人性的正常要求”，而不要人性的反常与变态，如此而已。这是我长期不喜欢魏尔伦、纪德之类作家的原因。

同样，也正是这样一个黑白分明的尺度，使我哪怕在自己的一大癖好（看电影）中，也保持着这种选择。如像好几年前我就知道《沉默的羔羊》一片曾获奥斯卡奖，看过此片的朋友对霍普金斯演技都赞不绝口，但我却一直因为其中有变态的灭绝人性的场面而拒绝观看此片，至今依然如故，我甚至认为，一个艺术家用自己的才能去把可怕的残忍的变态表演得淋漓尽致，简直就是一件令人愤怒的事……

这种“情绪化”的习惯，具体到了萨德问题上，结果可想而知，情况是这样的：

在中国，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之初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多少人读过萨德的作品？我想，恐怕不会超过三五个

人。但从很早的时候起，凡有西方语言文化知识的人，大多认识 *Sadisme*（施虐淫、性虐待狂、残暴色情狂）这个词，而且知道它来自十八世纪法国萨德侯爵其人的小说。顾名思义，此词极为可怕。因此，萨德早就在中国“恶名远扬”、“臭名昭著”了，真正可谓属于“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之列。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谁也不会去研读萨德，不会去评价萨德。

凡涉及研读与评论，无庸讳言，就可能存在着两个层次，一个是公开评论的层次，一个是私下倾向的层次，前者是一种社会行为，它往往必须在社会政治条件、道德规范与意识形态标准所允许的范围里进行，往往必须具有道貌岸然、冠冕堂皇的外表，后者则是一种个人思想自主的状态，存在于个人自由的狭小天地，由于种种非常实在，甚至非常严酷的原因，它难以转化为社会行为。因此，两者几乎从来都是不完全一致的，甚至是互相分离、分裂的，特别在我们这样一个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国家里更是如此。如果说，我自己在本学科或超出学科之外的很多问题上都有这种分离与分裂的话，在萨德这个问题上表里倒是颇为一致，都持否定的态度。

我在《法国文学史》上册十八世纪一编中，比法国老本的文学史稍为开放一点，但论及到了萨德，完全持否定态度。这是“大环境”中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小态度”，而对我自己来说，

这又并非违心之言。之所以如此，则与我所属于的这一代人在两性问题上的真实思想倾向与内在情感有关。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一个严酷的时代度过青少年时期、中壮年时期的。闭关锁国、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上山下乡、思想改造、道德告诫、纪律处分等等、等等，像一个密集的火力网，使自我不可能也不敢越雷池半步，具体在性的问题上，形成了我们很多人身上的两种明显的倾向，它们既表现在外作为社会言行方式，又存在于内不失为一定程度的主观真诚。一种是粉红色清教徒倾向，它虽然还没有达到禁欲主义的地步，但至少是节欲与抑欲的，反正离《十日谈》式的纵欲与颂欲足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之所以是“粉红色的清教徒”，则是因为作为革命时代的子民，身上还不时有“私心杂念”与“自然本能”在躁动，这残留着伊甸园那颗禁果的影响，总达不到革命时代那种“红彤彤”、“红艳艳”的纯度。另一种则是准柏拉图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虽然并没有达到空灵的绝欲的地步，但至少是重感情、讲文明、崇风度、尚格调、求情趣，对于属于“欲”那个领域，不说完全愚昧无知，但确实孤陋寡闻，即使对高罗佩的学术著作所谈论的那些房事也知之甚少。总而言之，尚处于一种幼稚的半蒙昧阶段，用后来新潮派人士的话来说，我们这一代是“比较传统的”。既然对于人类性关系中那些正常的自

然的名堂、花样、招式都大惊小怪，对于与萨德之名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反常的、变态的东西，当然就会视为瘟疫，掩鼻远避了。

其实，我对萨德的揆拒与否定，不论是在“表”的层次还是在“里”的层次，根由都是先验式的，都只是顾名思义、望文生义而已，并不是通过切实的研读，然而这种盲目性却持续了多年之久……

“藏书不读，借书读”，这是藏书者、读书者常有的一种可笑的陋习，直到有一天我应验了这一陋习的全过程，我对萨德才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1988年我在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借书读而结识了萨德这一个“魔鬼”。

3. 流连于蓬皮杜文化中心的内外

每次到巴黎，我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就是跑图书馆以及跑书店，那些书都不属于我，我只可能购买很有限的几本，只得抓紧时间“借书”看，只要我会见作家、学者的日程中有空隙，除了到影院去“漫步”、到拉雪兹神甫公墓去“沉思”，图书馆就是跑得最勤的地方了，而在图书馆中，蓬皮杜文化中心对我的吸引力要算最大。

我喜欢蓬皮杜文化中心，首先是因为它这里特别方便

——交通方便，处于市中心，很多我常去的地方就在它周围不远；进出文化中心很方便，没有任何手续；在文化中心内各部门之间通行走动很方便，书籍、报刊、美术、影视、音乐以及各种展览的各个楼层与大厅任你自由来往选择；阅览与观赏方便，书刊均为开架自取；行动也很方便，你可以在阔大的阅览桌前找一个座位，也可以在宽敞的阅览厅里，随便找一把散落在各个角落的椅子，还可以就近在书架前席地而坐，蓝色厚绒的地面似乎比坐椅更柔软……

我喜欢蓬皮杜文化中心，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它可以说是从法国到全世界文化的一个丰富无比、无所不有的巨大宝库，每层楼的图书馆、资料阅览室就有足球场那样大，陈列的图书、报刊、资料如海洋水面那样一望无边，一个人在这里面，即使“皓首”，也是难以“穷经”的。

但这里的气氛，却又不像巴黎国立图书馆那样肃穆、凝重，它不给人以沉重的学术压力，不强迫你去作艰深的学术思辩，它提供给你的是一个丰富多彩而又宽松悠闲的氛围。你要看有关学科的理论书籍或历史资料书籍，只要掌握图书编目的规律，就可以在开架上找到；你如果陷在一个问题中钻研了好久，略感单调，眼前的开架书上有如此多其他的书籍可以供你随便翻阅，也许，其中有一页使你产生了奇妙的文化联

想,而有心驚八極、自由飛翔的快感,也許偶爾又另有一處竟深化或補充了你原來的理論思索,使你獲得鑽研的愉快,對原來那個略嫌單調的問題重又燃起了強烈興趣;你如果想更多地“換換腦筋”,就可以隨意到其他展廳去翻閱文化休閒性的雜誌與畫報,其種類多得出奇,使你如墜萬花叢中。要是你想更徹底地放鬆一下,那你就可以到其他的樓層去參觀藝術展覽,去看電影或者坐在一台電視機面前觀賞節目,要不就坐在一張柔軟的椅子上,戴上耳機,那里面有各種優雅的音樂……

而且,蓬皮杜中心豐富的文化內涵,還不僅限於那一幢極為龐大、造型奇特的現代化的巨型建築,還得包括它樓前的那個大廣場。這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廣場,這裡,有演啞劇的,玩雜耍的,變魔術的,為人画像寫生的,出售繪畫作品與工藝品的,演小品的,跳舞狂歡的,奏樂賣唱的……從蓬皮杜文化中心的高層向下望去,廣場上熙熙攘攘穿著各色服飾的人群,不時聚散分合,就像萬花筒里變幻著的彩色圖案。

如果你想徹底離開一下文化,想滿足一下其他好奇心,你也可以從蓬皮杜文化中心前面的聖馬丁街漫步而行,僅二百米就通到了與它平行的聖但尼斯街。它与布洛涅森林齊名,是巴黎兩道著名的“性風景線”,其實堪當此稱的,何止這兩處,紅磨坊也明顯帶有此種色彩。

圣但尼斯街相当狭窄，只有四五米宽，据说它在中世纪却是全欧洲最宽的街道。我这次来巴黎时，它显然比几年前“清淡”了一些，两边的商店，“性”味似乎还不及红磨坊那样浓烈，街道也比以前干净整齐多了，白天几乎看不出是一道“性风景线”，来来往往的大都是到巴黎观光、进出于蓬皮杜文化中心的外国旅游者，他们很多人坐在街口的小店悠闲地喝着饮料，观看街景……这里的气氛之所以如此清淡，很可能是蓬皮杜文化中心就在近旁，早已逐渐以其雅气冲淡了这条街的秽气……

每次我上蓬皮杜文化中心去时，总是一清早用完早点就动身，到了那里，不是阅读，就是动笔或者悠闲地浏览，甚至逛来逛去，中午时分则走出中心，到附近用餐。在圣马丁街口有两家面包坊，香飘周围百米，柜窗里简直就是流光溢彩，法国的面点本来就举世闻名，而且又是新出炉的，其美味真是无与伦比，我觉得比马第维先生陪我游罗瓦河流域时所吃的那些法国大菜要好上百倍……真是一个没有品味的平民……

午饭后，我在文化中心前的广场上这儿看看，那儿瞧瞧，然后再回到阅览室去工作两三个小时，直到将近傍晚时收工放学。返回寓所的路上，我一般总要经过圣但尼斯街。几乎每一次，我都带着低层次的好奇心，想看一看八十年代末的巴

黎神女，大概是因为还没有到“上市”的时候，我几乎没有碰见过一次，仅仅有那么一回，我看见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站在街角，从巴黎朋友曾给我描述过的站立位置与姿态来看，她肯定是神女无疑。她身穿浅灰色西服套裙，剪裁入时，淡雅得体，她身材苗条性感，容貌姣好健康，神情沉静自然。应该说，她称得上是端庄而又充满了魅力，如果不是此地此情此景，我肯定会把她当作一个高级职业妇女。我不由得大大放慢了脚步，见她站立在街头候客，游人们从她面前悠闲而过，并无人问津，我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近乎“怜香惜玉”之情，我走过圣但尼斯街之后，心里仍念念不忘，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性？她那么素雅漂亮，怎么流落到这一种境地？……为什么不鼓起勇气走到她跟前随便问一声“Combien”？那至少可以了解一点巴黎某种特殊的行情……甚至也不妨请她喝一杯咖啡，就像在巴黎圣母院广场上和偶然碰见的一个游人随便地聊上几句一样……然而，所有这些一闪而过的“私心杂念”，几乎立即就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了，我毕竟属于特别循规蹈矩的一代人，这一代人被称为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啊，老实本分的一代人！不敢出格的一代人！……

4. 在文化中心结识“魔鬼”

我那次在蓬皮杜中心的读书生活，原本并无明确的目标，起初，只是想广泛浏览浏览，以求获得一些较新的学术文化动态。当然，由于我曾经被萨特问题的麻烦纠缠了相当一个时期，虽然事情已经过去，《萨特研究》也早已得到了再版重印，我难免仍在文化中心的书架上“故地重游”一番，正是在那些关于萨特的书籍旁边不远，我发现了一大排关于萨德的书籍，其数量之多，甚至大大超过了萨特。

一个是曾经风靡全球的二十世纪大思想家、大作家，一个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人轻弃、被人耻于问津的文人，在文化中心的书架上却地位悬殊，初看起来简直就是严重的倒置错位，这使我深感意外，甚至有点感到惊异……

书架上的这一大堆书，一部份是萨德的作品，也就是 10/18 丛书本的那些小说，大多数是有关萨德的专著、论文集以及有影响的杂志所推出的萨德专号，足有二三十种之多，基本上都是出版于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后期的这二十年间，其中七八十年代出版的更占多数，有的还是英美学者所写的专著，当时被译成了法文……面对着这种情况，我马上悟出一个结论：这二三十年来西方学术界显然出现了一股萨德热，以

致围绕这位作家的大部头学术专著频频问世,即使是有法共背景的《欧罗巴杂志》也赶了这班车……

蓬皮杜文化中心以其文化视角的现代性与文化反应的敏锐性而著称,它的图书馆、阅览室中的开架书库都是不断补充、不断更新、不断推陈出新、不断灵敏地反映出文化走向的开放体系,我在书架上所看到的上述现象,就是它在萨德问题上的一个反应、一个态度、一种观点、一种评价……我总不能视而不见吧,总不能再闭关自守吧,我不能不走出我的观念意识形态的硬壳,松动了盲目摈拒的僵化立场,开始向“魔鬼”萨德走去……我确定了这一次在蓬皮杜文化中心读书生活的惟一目标,那就是:萨德。

这些关于萨德的书有各种各类,有研究萨德生平历史的,有评价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有论述他的社会历史观、宗教观的,有评析他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有剖析他笔下的性心理、性变态的……倾向与视角亦各有不同:历史社会学的,女权主义的,心理分析学的,等等。不论这些论著的方法、角度与论述的方面有什么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共同的态度,那就是把萨德视为人类精神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一个具有硕大的文化分量、丰厚的历史社会内涵、深刻的人文心理的文学家,一个带有巨大的超前性、与二十世纪人类学、社会学、心